

历世达赖喇嘛传记中的皇帝观念与政治认同^①

陈沛杉

【摘要】以历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教代表人物在其传记中对清朝皇帝有大量的描述。这些记载所呈现出的皇帝观念既有政治想象与政治意向，也饱含政治情感与政治认同，并以充分的历史事实表明：西藏地方与清中央王朝关系的基础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供施关系，而是具备实质内涵的政治隶属关系。

关键词 达赖喇嘛; 皇帝观念; 政治意向; 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X)(2018)03-0118-07

20世纪中叶以来,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开动宣传机器,不断著书立说,一再试图通过刻意夸大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在宗教层面存在的檀越关系来有意抹杀二者在政治层面上的隶属关系,得出二者之间“独立”的结论,进而达到分裂中国的企图。国内藏学工作者为此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与论著进行驳斥,并以翔实的史料为中国自元以来就拥有对西藏无可置疑的主权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藏文文献未能受到足够重视而导致的西藏地方自身的历史情感与立场被忽略,其论述的客观性亦受到西方社会的某些质疑。但事实终究胜于雄辩,这些历史文献仍然真实地记录了藏族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存与发展轨迹,尤其是一至十二世达赖喇嘛传记中关于清朝皇帝的大量记载所体现出的西藏地方政教人物对中央王朝高度的政治认同^②与查尔斯·贝尔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传》、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达赖喇嘛自传》对上述记载的回避与篡改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既可作为对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进行全新而系统的阐述的基础,也无疑是使西方社会不具偏见的读者了解真实的西藏,从而判明是非、以正视听的绝佳范例。

一、宗教称谓与政治想象

在历世达赖喇嘛传记中,清朝皇帝总是被冠以“文殊大皇帝”(འཇམ་དབྱངས་ཤང་མ་ཆེན་པོ)的称谓,并被置于

① 本文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藏文文献中的皇帝观念及其演变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构建研究”(17CMZ011)、四川藏羌彝走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团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国家理论中,古代国家认同问题的核心就是要把族群认同整合成共同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一个集合化的概念,但政治认同的构建却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正是以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等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个体认同的总和构成了西藏地方政教人物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情景。

“文殊大皇帝乃一切政教之主”^①的神圣地位,“遵照文殊大皇帝的敕谕,担负起政教事业的义务”^②也由此而成为西藏地方政教人物在政治生活与宗教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文殊大皇帝”这一称谓带有极强的宗教性与政治性。文殊是大乘佛教中以代表智慧著称的菩萨,与普贤菩萨并为释迦牟尼佛的两大侍者。明清时期,西藏地方对文殊菩萨的尊崇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宗喀巴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以文殊菩萨的名义要求僧人守护戒律和重整佛教修行作风,其本人“甚至一日间的所作所为等也都向本尊(文殊)启问后,唯以本尊所说为依据”^③。在藏文文献中,关于文殊菩萨化身的传说与信仰也俯拾皆是,并呈现出丰富的政治想象。在《西藏王臣记》的描述中,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怙主于化度事业转动金轮,其金轮中之任运自成之大轴者,即吐蕃王种,人中圣贤之赤松德赞王也”^④。随着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治隶属关系的确立,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更是认为西藏王统“自彼矢中魔王朗达玛邬冬赞百瓣开放之心蕊,送其往于大张獠牙如雪峰新裂之闫王城中,此后王臣之份不存者约三百余年,迨后始有受命于天,升等文殊菩萨皇帝之宝座之霍尔诸王降临世间”^⑤,而将元朝皇帝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并将中央王朝奉为正朔。也正是由于文殊化身所具有的权威性,即使五世达赖喇嘛也不敢僭越这一称谓,据其自传记载:“岳莫活佛通过素而金刚持大师转告我说,《伏藏授记》中所说的具业心传七弟子中,其中文殊的化身将出现在卫地,如果不遇到意外的遮障,他将教化汉、藏、蒙古各个地方。他们认为我是文殊的化身,我想我怎能奢望我是文殊的化身呢?可能只是与文殊菩萨有些缘分而已。”^⑥

关于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对清朝皇帝所冠以的“文殊大皇帝”称谓,美国学者何伟亚认为“这一现象说明清帝所具有的独特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使得清代得以最大限度地不同民族或族群纳入统治,从而建成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一统帝国”^⑦。上述评价颇为中肯,因为西藏地方政教人物对清朝皇帝的宗教称谓与政治想象充分表明清朝皇帝在西藏地方政教事务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既是西藏地方政教人物对现实政治的宗教表述,也为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统治权提供了宗教上的合法性,同时也是对范普拉赫之流所编织的“西藏人不仅否定自己真的受制于满清皇帝,而且也没有直接臣服于皇帝的权限”^⑧的谎言最为有力的驳斥。

二、政治意向与朝觐受封

早在明朝时期,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就已经有了进京朝觐的意向。据《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⑨记载:“明朝皇帝派遣乘坐八抬大轿的使臣前来钦赐达赖喇嘛‘灌顶大国师’封号及种种头衔,召请去北京,达赖喇嘛认为这是吉祥的缘起,于是接受了赴京的召请。”^⑩在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时期,明廷又赐予达赖喇嘛“普持金刚佛”的封号、印信和僧官制服,并召请其前往北京,“达赖喇嘛为缔结善

① 章嘉·若贝多杰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藏文原文为: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དམ་ཆེན་པོ་བཙུན་སྒྲིབ་ཐམས་ཅད་ཀྱི་བདག་པོ་ཡིན། ལྷ་མོ་རྩལ་བའི་དོན་ལྟེན། ལྷ་མོ་འབངས་ཀྱི་ཕྱི་འབྲུག་པ་སྐོར་བཟང་བསྐྱེད་ཀྱི་མཚའི་རྣམ་ཐར་དཔག་བསམ་རིན་པོ་ཆའི་ཉི་མ་ཞེས་བཞུགས་སོ། བེ་ཅན། གང་གི་ཤོད་རྒྱུ་པ་དཔེ་སྟུན་ཁང་། ༡༩༧༠། ༡༤༥

② 第穆·图丹晋美嘉措:《八世达赖喇嘛传》[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藏文原文为: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དམ་ཆེན་པོ་འཇམ་མགལ་བཞུན་ཆོས་སྐྱོང་ལྷན་ཁག་ཆེན་པོ་ཞེས་བཞུགས་པས་ལ་དབང་སྐྱོང་བཙུན་པའི་རྣམ་ཐར་འཛིན་པའི་མཁུ་ལངས་པའི་རྩན་ཞེས་བཞུགས་སོ། བེ་ཅན། གང་གི་ཤོད་རྒྱུ་པ་དཔེ་སྟུན་ཁང་། ༡༩༧༠། ༡༥༤

③ 法王周加巷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④ 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⑤ 同上,第59页。

⑥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

⑦ [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利益冲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⑧ [荷]迈克尔·C·范沃尔特·范普拉赫著,跋热·达瓦才仁译:《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力与前景的分析》[M],台北:雪域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⑨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等译:《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⑩ 同上。

缘,接受了邀请”^①。但由于两世达赖喇嘛均在接受召请后不久去世,这两次进京朝觐的意向并未最终实现。

清朝时期,数世达赖喇嘛对中央王朝的皇帝表现出更加明确的政治意向,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进京朝觐受封以及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移居理塘期间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朝觐意愿就是这种政治意向的充分体现。明末清初之际,西藏地方处于和硕特蒙古的实际控制之下,据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所撰写的《西藏王臣记》记载:“霍尔历三月十五日,依时轮算规为新年开始之日,汗王即成为全藏三区之主。王令如大白伞,覆盖于三界之顶首,对于佛家各宗均一视同仁,虔诚敬重。”^②但是,上述描写并不一定代表阿旺罗桑嘉措对固始汗的真正认同。首先,《西藏王臣记》是阿旺罗桑嘉措在固始汗的授意下写作的,“当时成书的著作不论是韵文还是散文,都夹杂着很多偈颂”^③。其次,阿旺罗桑嘉措很早就意识到“请固始汗进兵暂时不失为善策,但长远结果不好”^④,在固始汗领兵入藏之后,阿旺罗桑嘉措很快就感受到“对于向往的地方没有去留的自由,受人支使,令人伤感”^⑤。因此,阿旺罗桑嘉措在其自传中将固始汗描述为:“修习纯正妙法,这样的朋友再无处去寻求,然而,在西藏这块土地上,如果有一领袖,时局才会安定,萨迦、噶举、宁玛等其他教派四分五裂的局面才可能有所改观”^⑥,可能更接近阿旺罗桑嘉措真实的政治意向。固始汗曾要求阿旺罗桑嘉措去青海,阿旺罗桑嘉措就此事向日增月摩瓦活佛请教,得到“现在的蒙古人并不是真正的邀请者,待到若干年以后,与蒙古人服饰不同的人会从东方前来迎请”^⑦的答复。因此,阿旺罗桑嘉措委婉地拒绝了固始汗,而在清朝皇帝发来邀请时欣然前往北京朝觐。阿旺罗桑嘉措出发之前对于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有了更为现实的思考,认为“汉、藏、蒙古三个地区的领袖中,有的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有的是君主和臣属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是发誓说不会出现这些关系,不过当时在四个强有力的喇嘛座次上我连最小的喇嘛也算不上”^⑧。在前往北京途中,阿旺罗桑嘉措更是不断上书清朝皇帝。顺治九年(1652)九月二十一日,阿旺罗桑嘉措在奏疏中声称“尚有密奏之事”^⑨,6天之后又再次上书:“自当兼程而进,更有密语,去使面奏。”^⑩次月,阿旺罗桑嘉措在到达黄河岸边时又一次在奏疏中向清朝皇帝提及“诸要事,去使面奏”^⑪。阿旺罗桑嘉措迫切想要向清朝皇帝表达的“密语”与“诸要事”显然不可能仅限于宗教事宜,而是很可能涉及其自身对清朝皇帝的政治诉求。阿旺罗桑嘉措入京之后,清朝内部对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置意见,一是“喇嘛原系特召,当询其情事,其言宜于我则从,不宜于我则已”;二是“喇嘛既系特召,当赐以金银缎币,酌封名号,给之册印,不加询问为便”^⑫。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最终采取了后一种意见,阿旺罗桑嘉措对此非常失望,在北京仅一个月,便以水土不宜为由告归。顺治皇帝以“待青草时,更

①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等译:《——四世达赖喇嘛传》,第316页。

② 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第124页。

③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第152页。藏文原文为:ངག་དབང་ལྷ་བཟང་ཐུ་མཚོ་འདི་ལྷང་འབྲུལ་པའི་རྣམ་ཅེད་ལྷགས་བརྒྱུད་ཀྱི་སྐུ་ལྷ་བཞུགས་པ་ལྟ་གཞི་གསལ་བཟང་། ལྷ་ས་ཐོད་ལྷག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ལྷན་ཁང་། ༡༩༩༩་ནས་ ༡༩༩༩་། ༡༩༩༩་། ༡༩༩༩་།

④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第128页。藏文原文为:ངག་དབང་ལྷ་བཟང་ཐུ་མཚོ་འདི་ལྷང་འབྲུལ་པའི་རྣམ་ཅེད་ལྷགས་བརྒྱུད་ཀྱི་སྐུ་ལྷ་བཞུགས་པ་ལྟ་གཞི་གསལ་བཟང་། ལྷ་ས་ཐོད་ལྷག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ལྷན་ཁང་། ༡༩༩༩་ནས་ ༡༩༩༩་། ༡༩༩༩་། ༡༩༩༩་།

⑤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第141页。藏文原文为:ངག་དབང་ལྷ་བཟང་ཐུ་མཚོ་འདི་ལྷང་འབྲུལ་པའི་རྣམ་ཅེད་ལྷགས་བརྒྱུད་ཀྱི་སྐུ་ལྷ་བཞུགས་པ་ལྟ་གཞི་གསལ་བཟང་། ལྷ་ས་ཐོད་ལྷག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ལྷན་ཁང་། ༡༩༩༩་ནས་ ༡༩༩༩་། ༡༩༩༩་། ༡༩༩༩་།

⑥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第137页。藏文原文为:ངག་དབང་ལྷ་བཟང་ཐུ་མཚོ་འདི་ལྷང་འབྲུལ་པའི་རྣམ་ཅེད་ལྷགས་བརྒྱུད་ཀྱི་སྐུ་ལྷ་བཞུགས་པ་ལྟ་གཞི་གསལ་བཟང་། ལྷ་ས་ཐོད་ལྷགས་མི་དམངས་དཔེ་ལྷན་ཁང་། ༡༩༩༩་ནས་ ༡༩༩༩་། ༡༩༩༩་། ༡༩༩༩་།

⑦ 五世达赖喇嘛著,陈庆英等译:《五世达赖喇嘛传》,第152页。

⑧ 同上,第183页。

⑨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0页。

⑩ 同上,第21页。

⑪ 同上。

⑫ 同上,第22页。

⑧ 一史馆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纪山奏报七世达赖喇嘛因晋封颇罗鼐为郡王谢恩情形折》[Z]，档案号3—2—0922—005。

定,所以众人都极为欢乐和崇信。”^①自此之后,克珠嘉措、成列嘉措均是通过金瓶掣签的方式分别成为第十一世达赖喇嘛和第十二世达赖喇嘛。光绪元年(1883),第十二世达赖喇嘛成列嘉措圆寂。由于除了在拉萨东南部达布地区的朗敦发现转世灵童外,其他地区均未发现类似的灵童,西藏摄政通善呼图克图与八世班禅以及拉萨三大寺全体僧俗官员联名向清朝皇帝奏请该灵童免于金瓶掣签。鉴于转世灵童只有一名并经各方公认,清朝皇帝最终同意毋庸掣签。查尔斯·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也不得不承认:“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发现已由乃琼寺的神谕所确定,并已呈报拉萨的清朝驻藏大臣,因为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灵童两岁时被护送到拉萨,藏在一个隐蔽的处所,直至皇帝批准承认其为达赖喇嘛后为止。”^②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时已值民国,但清朝皇帝所确定的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并没有随着清廷的轰然倒塌而瓦解。民国29年(1939),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事宜中是否执行金瓶掣签达成最后协议:“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于抽签,特准继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③虽然国民政府没有改变西藏地方选定的灵童,但由其来作为最后的裁定者仍具有决定性的政治意义。

四、结语

历世达赖喇嘛传记中关于清朝皇帝的记载所呈现出的皇帝观念充分反映出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教人物在西藏地方归属中央王朝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折射出西藏地方政教人物对于清廷在西藏地方推行的以世俗政治集团为主导的郡王制度、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制度、金瓶掣签制度的理解与认识,以及对上述制度的价值偏好与利益诉求。虽然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一再坚持:“检视此生的经历,以及以佛弟子的信念见证,我毫不迟疑的认定,我在精神上与之前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白观音及佛陀本人相应”^④,但其对于清朝皇帝给予自己前世的恩典以及前世对于皇帝的政治认同与情感似乎已全然忘记了,在自传中只是淡淡的提到:“清朝皇帝也是佛教徒,称达赖喇嘛为阐教王”。^⑤尽管如此,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选择性遗忘并不能将历世达赖喇嘛传记中关于清朝皇帝的记载一概抹杀。清朝皇帝通过对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册封与授权而由此确立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充分表明二者之间具有无可辩驳的实质上的君臣关系。历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坐床、亲政均由清朝皇帝所决定,这既是二者君臣关系的生动体现,也以无可争辩的史实证明西藏地方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本文责任编辑 央宗]

[作者简介] 陈沛杉,历史学博士,阿坝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四川汶川 623002)

① 洛桑赤列朗杰:《十世达赖喇嘛传》[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② 查尔斯·贝尔著,冯其友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第29页。

③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档案史料汇编》,第2789页。

④ 达赖喇嘛著,康鼎译:《达赖喇嘛自传》[M],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⑤ 同上,第12页。